

中国学者海外演讲丛书

境外谈

麻天祥 著

佛



李延青 / 主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



B243
M007



李延青 主编

中国学者海外演讲丛书

境外谈

麻天祥 著

佛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境外谈佛/麻天祥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3

(中国学者海外演讲丛书/李延青主编)

ISBN 7-80673-365-5

I. 境... II. 麻... III. 佛教 - 文集 IV. B9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73961号

丛 书 名: 中国学者海外演讲丛书

主 编: 李延青

书 名: 境外谈佛

著 者: 麻天祥

选题策划: 李津生

责任编辑: 张采鑫 张晓黎

美术编辑: 李文侠

封面设计: 王 旭 李文侠

责任校对: 李 鸥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 - mail: hswycbs@heinfo.net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04年3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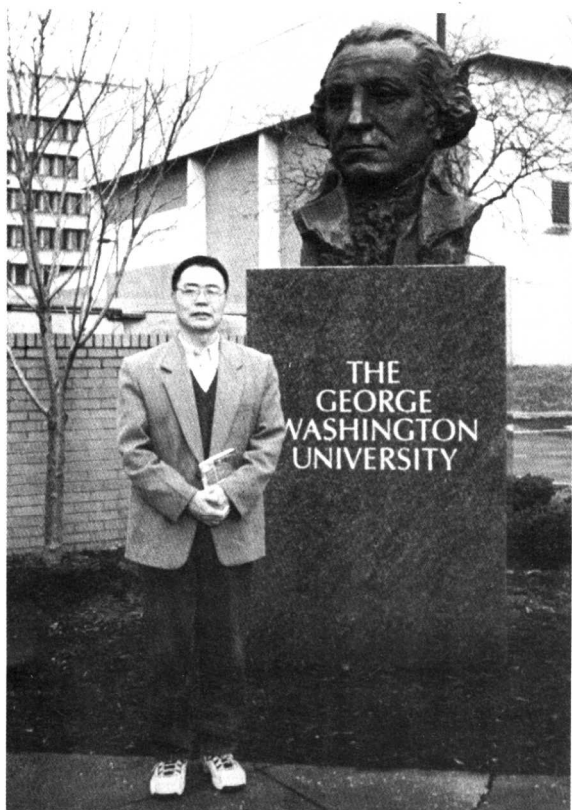
200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80673-365-5/1·216

定 价: 1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麻天祥 1948年生于河南清化。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佛学、宗教与医学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学术史、中国佛学以及宗教与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宗教研究》等境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有《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中国近代学术史》、《汤用彤评传》、《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佛学与人生》等学术专著10余种。曾于1995年、1997~1998年两次赴美国和加拿大从事中美文化交流史和比较文化的研究。



传播者礼赞

——《中国学者海外演讲丛书》序

余秋雨先生在一次谈中华文化复兴的演讲中，把既往中华文化向世界的传播形象比喻成“三座桥”。第一座是“经典理学之桥”，指的是我们古代的好多经典——如先秦哲学，对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第二座是“世俗民艺之桥”，指我们许许多多华人漂洋过海，从而将自己日常的文化生态方式——比如龙舟、舞狮、功夫、餐饮等——具有质感的文化实践状态带到了世界各地；第三座曰“信息传媒之桥”，指当年传教士写回去的信件和游记、调查报告的出版问世，以及现在的摄影作品、纪录片、电视、网络等等的传播。由此，余先生引出了他认为未来需要搭建的能够带来或者说标志着中华文化复兴的“第四座桥”——即在承接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表现活生生的中国人群体灵魂的学理或形象性的大作品的产生——它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邻居共同感动，从而使世人真正明白中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这次演讲中，余先生还提出了自己一个判断：2020年左右，中华文化可以出现一个范围相当广泛的复兴。我们十分钦佩余先生为中华文化复兴身体力行的积极努力和呼吁，但却不敢同意余先生这

一过于热情的判断。

诚如余先生所言，“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不见得有文化尊严”，“中国人的尊严最终应该由文化来给予”。如果“当好多民族都能够用自己的文化增添自己的重量，都用自己的文化来沟通世界的整体标准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地球就会变得更美好”。但是，一种文化能否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比较大的复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既有其主观因素也有其客观因素，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中华文化能否复兴，我们想至少应该考虑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中华文化自身是否具有与时代相适应的内在素质；二是时代是否具有相应的文化需求。所谓文化的内在素质，是一种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价值观念和内涵。在经济居统治地位的当代，全球化、市场化为文化的传播、融合、发展创造了环境和机遇。而高科技、数字化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等一系列矛盾的凸显，使得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平衡已成为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认识和感发生命的力量及其内在的重和谐、修身等价值导向无疑能够帮助市场经济时代的人类发现、认识和完善自我，满足人类的文化精神需求。然而我们认为，现阶段时代的普遍文化（精神）需求尚未形成——这一点正是阻碍中华文化复兴的根本所在。

时代的文化需求应该是人类的一种自觉行为。对于刚刚彻底摆脱战争和动乱不久，正以全副精力投入经济建设之中的中华民族，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需求何时才能得以产生？我们认为最大的可能应该是在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某一历史时期。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的复兴需要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基础和前提。几年前，加拿大皇家学会华裔院士叶嘉莹先生上书国家有关领导，建议在中小学普及古诗词并得到采纳。叶先生数十年奔走于世界各地，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诗词和中华文化的推广传播。



她的建议说明，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不是仅靠几个人的努力就能办得到的，必须具备广泛的基础。所以我赞同余秋雨先生的说法，即使是标志中华文化复兴的那种大作品，首先“第一感动层应该是海内”。一种文化只有首先在本土繁荣，进而才可能获得世界性的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看来，文化的繁荣并非一定会与经济同步，但经济对于文化需求产生的作用却不容忽视。中外文化史上不乏“经济与文化发展不平衡状态”的成例，如大家熟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印度，当时这两个国家的经济都十分落后，但是却产生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这样的一批灿若星辰的大作家。然而我们在注意到这些国家贫穷落后的时候，更应该注意的是作家本身衣食无忧的家庭背景和良好的文化修养、丰富的精神追求。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繁荣亦不都产生在太平盛世，然而，以文取仕的制度和文人的社会地位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含金量”。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可见，精神需求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心理学大师马斯洛把人的需要从低级到高级分为七个层次，并认为只有较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时，较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发生。他把属于文化范畴的“认识需要”和“审美需要”列在较高的层次，而把“生理需要”视为最低级的基本要求。中国有句俗语：十年树木，百年育人。有一种理解，百年就是三代人——说一个家族要经过三代人的努力，认真准备，才具备真正培养造就人才的能力。这里的努力、准备应该主要是指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储备和积累。

现阶段，中国致力解决的可以说仍是“生理需要”，经济建设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都将是整个民族压倒一切的历史性重任。但可以肯定，随着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全民文化素质、品格的不断提高，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国将会逐步形成一个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相对成熟、独立，并具有广泛性的“富裕阶

层”——他们不但具有稳定可观的经济收入，较高层次的文化修养和精神追求，而且还会具备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东方文化归属感，来自他们的自觉的文化追求将代表和体现整个时代的精神共鸣，成为催进中华文化实现世界性复兴的必然条件。

然而，一个时期的社会文化需求是不会凭空产生的。正如“百年育人”是文化、经济等条件积累的产物一样，余秋雨先生所期盼的那种能够表现中国人“灵魂的群体存在状态”的大作品的产生，恐怕也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人类登月的壮举固然辉煌，但走向辉煌的过程却意味着艰辛与寂寞。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弘扬者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们是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最前沿、最直接的铺路搭桥者，《中国学者海外演讲丛书》正是这种传播的结果。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学者、作家、艺术家的对外学术交流不断加强，这里选择的三部书稿就是我们的学者在国外大学等学术场所的演讲稿，它们或谈美学或谈佛学或谈文学，既有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又充分体现了学者在各自领域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因为环境和听众等因素的不同，这类讲稿均表现出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特色，亦为国内读者的学习研究提供了方便，这也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原因之一。

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为中华文化复兴起到增砖添瓦的作用。

编者

2003年10月7日



莫道海外无知己 谈佛天涯若比邻

——写在《境外谈佛》前面的话

曾记得，早年读书，有一则关于青年孙中山见李鸿章的故事。孙先生气宇昂然，对那位朝廷大员，不卑不亢，同样以兄弟相称，要求会见。李鸿章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年纪轻轻、初出茅庐的青年人，竟敢在一方诸侯的面前称兄道弟。于是，这位快快不乐的封疆大吏，充满了蔑视，也带着一点儿嘲讽，出上联交门下转递孙先生。联云：持三尺帖，见一品官，小子何敢称兄弟？孙中山先生见联即对曰：读百家书，行万里路，布衣亦可做王侯。孙中山先生青年时期所怀有的高远理想以及气吞山河的气概姑且不论，对联中洋溢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欲成就伟大事业的人，不仅要读书明理，而且要览山川形胜，以增广见闻。这就是我们祖先常说的破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意思。试想，若无万里之行，哪里有“八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壮观景象，哪里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绝唱？至于从来没有到过岳阳的范仲淹，也就绝对写不出“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的洞庭山水，也就生不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

然而，本人于此实在可望而不可即。书么，还可将就读一些，“行路”难，也就难于上青天了。一则是财力不足，二则是兴趣不足，当然还有职业与时代的缘故。做一个人人们通常说的“西医”，Medicine doctor，自然不像过去的游方郎中，虽然同样目睹了太多的生生死死，却难得走出病房的巡查长路；实验室的工作，以及时代风雨冲刷去的坎坷际遇和劫后余生之感，尤其使我变得内向与封闭。思想上的驰骋，终究没有托起身体的飞翔；外面的世界尽管精彩，但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对甘于寂寞的我，毕竟有太多的陌生。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我重返校园之后，头上多了一顶方巾——博士的头衔，书自然也就多读了一些，但是，并非自觉，只是由于社会的呼唤。我带着越来越重的书籍，由北向南，自南返北，告别了黄河，跨过了长江，飞跃了南海和琼州海峡，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曾经在周秦汉唐故都，领略秦皇汉武昔日风采，大小雁塔落日余晖；也曾在风景秀丽的岳麓山，俯视橘子洲头，湘江北去；而今在烟波浩淼的东湖畔，遥望孤帆远影，日暮乡关。不仅如此，我还受境外的邀请，国家的派遣，相继走出了家门，走出了国门。我看了，听了，也讲了，交流了，无疑增长了见闻，丰富了思想，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尤其是在美国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的任务是中美文化比较研究，必须，也更有条件结识这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国家的方方面面。有白人、黑人，当然还有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有英国的淑女，剑桥的博士，南美与韩国的牧师；有就职于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专家，有从学校到政府各部的官员；有来自台湾早已在异国成家立业的老一代移民，有刚刚由大陆到美国淘金的中国留学生。在宗教方面，与我接触最多的还是那些来自不同国度，虔诚且以助人为乐的新教教徒，每逢周末，与他们在一起读经、唱歌、野餐与交流；也曾在庄严肃穆的天主教教堂参加过弥撒，在



乡间小镇的教堂里观察 Local Church 教派的特殊礼拜形式；还有与巴哈伊朋友们的家庭聚会……所有这一切，让我看到的是世界文化趋同的总体趋势，看到的是中国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作用。我难以忘却，在查经班（Bible study），曾经与来自港台以及大陆各地的天涯游子，满怀深情地唱着那首舒缓而又荡气回肠、充满思念却又无可奈何的歌：不是没有家，不是不想家，只是因为还有太多的人流落在天涯……不能忘记，所有的炎黄子孙，虽然身在异乡，关山难越，但故国之思，教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泯灭往昔的恩怨，一致为华夏民族的昌盛而自豪，为中国在世界上遭受的屈辱而愤愤不平。1997年6月28日，在DC的华人庆祝香港回归的游行，其规模之大，群情之激昂，以及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为美国华侨史上绝无仅有。正像侨居加拿大，致力于文化更新的梁燕城博士借他创办的刊物所寓意的：中国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一个政治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换句话说讲，哪里有炎黄子孙，哪里就有“穷理尽性”、“内圣外王”、“仁者爱人”的中国传统；哪里有以圣贤为终极追求的中国文化，哪里就是中国。

China Town，唐人街，正是这一文化概念在海外物化的具体形式。

然而遗憾的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佛学，在大洋彼岸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是在中国传统盛而不衰的华人圈子里，也难得问津。在那不算短的访美的日子里，我仅仅有一次走进了一个位于曼哈顿的佛堂，因为它小得实在不能称为寺院。书店里陈列的有关佛教的书，自然也属于不屑一顾的。在马里兰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戴·维廉（前任主任是首届驻中国大使李杰明，James lilley）说，本打算让我作一个关于禅宗思想的报告，但是又考虑到那些美国人根本不理解禅的思维，对他们谈

禅，其结果必然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所以只好作罢。正因为如此，光明日报社的一个驻美记者曾与我相约，撰写一篇有关禅在西方世界的报道，教我甚感为难。或者是看到了这些，感受到了这些，所以无论是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马里兰、维吉尼亚和新泽西，还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爱蒙顿，当我讲授中国哲学时，自然也就尽可能多地向他们传输一些佛学知识。不过也应当承认，在老一代的华侨中，确实还有人偏爱，甚至精通佛理的。我也接触到一些土生土长的美国学者，他们对佛教又有其西方式的理解。与所有的评论不同，圣地亚哥大学哲学系教授 Sandra A. Wawrytko 专门写信告诉我说：“在你的著作中，关于禅的中国起源的论述极富挑战性，并且肯定有助于澄清许多关于佛教在东亚传播与中国文化碰撞而产生的误解。”或许正是由此而获得启发：在基督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佛学的渗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是否也有它的一席之地呢？我曾有日记一则，这里引述或许被视为画足，但我认为，它多少可以说明，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尤其是它的辩证思维、生命哲学和审美观念，在未来的世界，或者说社会生活中仍然是不可取代的。

1997年7月11日 星期五 晴

……朱先生原就职 NASA（美国太空总署），是机械研究方面的高级工程师，刚刚退休。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河南同乡会的小型聚会上。朱家所居，纯系乡间别墅的风格，虽然像普通的住所一样分上中下三层，但比一般的要大得多。木制的阳台由房间直通室外的草坪，并且上部像跳台一样在房后延伸，俯视着宽阔的草地和围绕在三面的绿树。一种火红色的小鸟灵活地飞来飞去并啄食其间。晚风送爽，确实教人感到惬意。据说，树丛中也常有鹿家族的光顾，遗憾的是我



未能看到它们的情影。说是野餐，其实就是在房后的草坪上的聚餐。这类的聚餐，因为有烤肉，美国人通常称之为 barbecue。我们的“野餐”由朱夫人执掌炊事，当然也是三明治、可乐、色拉还有中国式的糕饼之类。朋友来时也带上点儿食品或鲜花，这也是美国人的习惯。

朱先生虽然是一位工程技术人员，但对禅宗情有独钟，而且颇善言谈，所以与我有更多的语言。据先生自述，幼年在湖北的一所寺院读书，常悄悄爬上禅房楼顶翻读那些似懂非懂的佛教经典，如此一读就是五年，自谓也是于佛学的一段夙缘。大概正因为如此，他对禅的理解也是非常学术化的。他一再强调，中国禅学之本质是儒道，是孔子和庄子，禅家所谓的明心见性就是儒家的“明明德”。显而易见，他更看重的是儒释混融。他对我的书——《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遗憾的是，我不能当时送他一册。我抱愧地表示，待9月份我妻子来美，一定赠书一本，敬请指正。相信重阳来临，当能偿还夙愿。

不觉之间，夜幕低垂，暮靄笼罩在房、草、树，以及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凉意逼人，哪里还有酷暑的感觉。老先生更是双臂接着双肩，我也开始瑟瑟地发起抖来。这里可真是避暑的好地方。

告别朱家，我们又驱车在晦明之间的夜色中。借着那一弯新月，并由那时隐时现的萤火虫伴随我们离开了“都市的乡村”，挤入红色的车流，沿着高速公路，由北而南，返回DC。当我们回到H街我的住处时早已是万家灯火了，荡漾在空气中的音乐声正渲染着校园周末的气氛。途中，朋友忆及当年赴美的景况，心境虽然平和，但隐约间仍能感到她对不堪回首的往事的诀别。她说，出来时确实没有想过不再回去，国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帝国主义的揭露，总还保留

着国外劳苦大众水深火热的感觉。然而，初到香港，在中文学校教书，每小时35元，已是国内一个月工资的一半还多，生活自然要宽裕得多。更何況，儿女在国内的学校里备受歧视，也难有出头之日，所以在地叔叔的帮助下来到美国之后，一切都变得好了起来，也就定居大洋彼岸了。一儿两女，全部读完直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又都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当她谈到儿子考入麻省理工学院之往事，兴奋之情不能自己。她特别告诉我，为了儿女们的前途，他们拼命地工作，积攒学费，然而，一旦儿子被这所著名的大学录取，即便获得与家庭收入相适应的奖学金以及勤工俭学的安排。其称颂学校为学生考虑以及计算周到之处，溢于言表，确实让人也能感觉到学校规范化的程度。不过，叫我难以理解的是，她辞掉年薪5万美元的稳定工作，卖掉了房子，只身一人，重返国土，在北京从事老年病学的服务。她丈夫由于其建筑设计的专业在美国难有用武之地，故而，在东南亚，包括港台、大陆四处奔波。倒是她又告诉我，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子女现已成家立业，生活得也都很好，她也就心安理得了。当我说现在国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果现在他们还在国内，她的子女同样能实现他们的辉煌，或许也一样能留学海外。她也相信这一点，但她说，那时谁又能预卜作为将来的现在呢？

谈到这些，又使我联想起朱先生讲述他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回国时的遭遇。那时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刚刚解冻，他作为一个久别故国的天涯游子，回乡探访杳无音信的亲人。然而，在他经香港刚刚要踏上多少年来魂牵梦萦的故土时，在海关被无端阻留数小时，行李也被全部翻检，在香港买来赠送亲友的物品也被一一查询。他笑着说，海关官员看到他带给亲友的麻油时，便责问他，难道我们国内连吃的



油都没有吗？直到距火车启动前十分钟，才准予放行，匆忙中还得收拾那些抛得满地皆是行装。朱先生谈起来看似轻松，脸上也挂着笑意，但我相信，我们都在为那一段把许多的朋友、甚至自己的同胞都视为敌人并加以提防的历史感到悲哀。

访美的每一天夜里，无论是华灯初上，还是夜阑人静，我都毫无例外地将一天的经历记录下来，即使是在旅途中，也会坐在机场候机厅的小椅子上，或飞行中飞机的舱位上写下自己的耳闻目睹与感觉。我常常沉浸在文化的思考之中，探寻中美文化的异同；聆听海外游子们心灵的倾诉，由他们的片言只语，透视他们赤子之心中热爱中华的恋母情结，观察他们血液中流淌的传统文化的因子。这里尤其吸引我的是，朱先生也像鲁迅先生说的手中有《论语》、《庄子》、《金刚经》三件小玩意儿的知识分子。他早年学佛，尽管他看重的是儒释混融，但特别强调，禅的本质是儒道，是孔子和庄子，仅以此而论，朱先生对禅理解之深，决非一般爱好者所能企及。然而遗憾的是，直到我离开美国，始终无缘与朱先生再次谋面而作竟夕之谈。

首次访美，时间短暂，没有做太多的安排。1998年再次登上大洋彼岸，刚落下脚便给自己规定了必须完成的四项任务：首先是中美文化比较研究的国家项目，其次是在实践中学好英语，第三是对美国社会作深层次的了解，最后便是在合适的条件下传播中国文化。其实，前三项均与此次访美的主题有关，那是必须做的；惟独第四项，既是我的专业，又是我的兴趣，更是我的心灵寄托，正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虽非必须，尤为必要。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我做起来也就心安理得，尽心尽力。虽然谈不上成绩斐然，倒也可稍慰平生。

刚到美国首都，便结识了 NASA 研究员，发明家候选人，也是 Chinese America Forum（美国论坛）杂志创办人李圣炎先生。他出生于河南信阳，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由台湾只身远涉重洋，在 Colorado 攻读并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数十年来异国漂流，不仅没有淡化他的民族情感，反而在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心理驱使下，意欲在多文化背景中的美利坚合众国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架起一座沟通中美文化的桥梁。是他介绍我认识了美国教育部的乔龙庆博士，以及由她发起并组织的“认养乡村学校图书室”（Adopt a Rural School Library）活动的所有成员。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国家图书馆、美国之音，有的是大学教师，公司职员；有的是高级翻译，在读博士；有的是 CIA（中央情报局）的语言教师，有的是 NIH（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技术人员。尽管他们的专业不同，职务不同，经历也不同，但是他们心系中华热土，对祖国母亲的眷恋，对优良的中华文明的热爱与向往却是一致的。以乔大姐为首的这个组织，对中国乡村教育所作的贡献遍及全国 25 个省份，一千余所学校。1998 年初，曾经撰写长篇报告文学《谁是上帝？》，介绍他们资助中国乡村学校的详细情况，在海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与他们接触，心里总有一种感觉，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总是在默念着：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乔大姐及她的同志们“考察”了我，接纳了我。此后将近一年，每隔一周的周末，我们便有一次聚会，不是在维吉尼亚乔龙庆大姐的乡间别墅里，就是在马里兰余小薇组长的座席上，交流学习的心得，探讨中国文化的奥秘。我不仅讲孔子、孟子，讲仁者爱人、理欲之辨的儒家思想，讲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庄子逍遥、齐物的道家哲学……当然还讲了具有高度思辨色彩的中国佛学。

毫无疑问，这样的讲授不同于在学校课堂。丰富的人生阅历，决定了他们有较强的理解力；日常事务决定的程式化的思维



与现代科学的形式逻辑，又形成对形上之学的抵拒；加之以往对佛学缺乏了解，较高的悟性常常无用武之地。因此我的讲授必须由基础谈起，而且要提纲挈领，深入浅出，还必须以事说理；必须用语言、形象清晰表述，力求避免烦琐的思辨逻辑与玄虚不可言喻的形式。如此虽增加了讲解的难度，但也在相互的交流与思想的碰撞中，或者说教学相长的过程中，逐渐为探索中国哲学的精髓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方法，从中获得了前所未曾获得的教益。

在那不算太长的时间里，我以不同的方式，向他们介绍了宗教、佛学的常识与核心内容，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引导他们理解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不断丰富、发展，即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以及它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双向互动；还有它对儒家，尤其是老庄道家思想的汲纳，及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全方位的渗透，不仅在世界观、方法论，而且在人生哲学、审美观念各个方面，参与熔铸中国人的生存模式。

关于佛学家的基本理论，缘起、空、因果等，对于他们而言，不是一无所知，就是百思不得其解，或者是虽有所知，却去本意甚远。记得我们在探讨“空”意的时候，我强调它不是没有，也不是有，而是在有、无之外的另一种存在，即有限之外的无限，是超二元对立，是否定！我引述了《金刚经》，也谈到了佛教思想中的八不（不一不异，不来不去，不常不断，不生不灭），甚至借用王阳明“四句教”中“无善无恶心之体”超越善恶的心本体观念作以比较。所有这些抽象的思维，由于在现实中不能得以印证，始终不能引导他们随心所欲，在“空”的观念中任意驰骋。他们甚至笑我借“复杂”二字一言以蔽之，似乎是痴人说梦。最终我引证《道德经》中的一段话，说车轴心是空的，车轮才能转动；器皿是空的才有盛物之用，房间是空的才有居住的价值，所以说“有之以利，无心以为用”，以道家的无，谈